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探源

吴琳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术语、一种多元文化思潮,具有十分复杂的渊源。运用谱系学的方法,从理论的萌芽、政治运动的兴起以及宗教哲学的传统三种不同的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深入考察和探究后,文章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更是一种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哲学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关注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对其加以辨析和解释,能够为学界提供审视和评价当代社会的新视角。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德奥博纳;伊内斯特拉·金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6-0142-05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生产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进入70年代,由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思考和寻找解决的办法。为了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兴起了一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许多女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女性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认识到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有色人种等边缘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了。

生态女性主义的渊源十分复杂,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理论,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还是一种看待世界和他人的哲学视角。作为二十一世纪一股汹涌澎湃的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独特的地位,笔者尝试对其渊源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揭示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以期为我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做一些补白的工作。

一、女性主义思潮的新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

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所有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观点均建立在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弗朗索瓦·德奥博纳(Francoise d'Eaubonne)是第一个使用“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的人。1974年,德奥博纳在她的著作《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中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在书中她指出,父权制是造成人口过剩和自然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而女性主义是治愈这两种危机的唯一途径。她说:“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让男性权力产生‘剧变’以及由女性引导一场改变权力结构的革命。”^{[1](178)}她号召妇女领导一场生态革命以挽救地球,这场生态革命将会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建立起新的性别关系。

德奥博纳在书中描述了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产生的背景并对这一术语作了解释。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与中欧的政治运动有关,德奥博纳的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定义正是来源于对这些运动的解释和总结。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政治运动中,最有名的是法国的前沿改革主义者。她们最初以为妇女争取堕胎权、离婚权和平等权作为她们的主要目标,1973年,她们发展了与生态有关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是以美国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提及的美国女性主义的生态语境为基础。但是前沿主义者没有能够坚持对生态的兴趣,不久就宣布放弃对生态的关注,重新转向她们原有的兴趣:堕胎、离婚权和

收稿日期:2010-08-22;修回日期:2010-10-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实践研究”系列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C752025

作者简介:吴琳(1973-),女,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理论。

平等权。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离出来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生态女性主义中心。中心的成员领导了一系列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运动。

1978年，德奥博纳在另一本书《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者转变？》中详细讨论并深化了在前一本书中未完成的话题。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德奥博纳指出，虽然从人口数量、生育方面来看，妇女本应该充当主宰的角色，但是男性统治的社会压迫女性，并使她们处于从属地位。不但如此，在男性神学和法学的控制下，妇女的生育权力被男性剥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女性的生育权都被男性控制着。地球和人类均受到人口过剩的威胁，男性像统治女性一样统治着地球。男性主宰的城市化、科技化的社会导致了土地贫瘠，男性造成的过度生育导致了人口过剩。面对这一现实，她呼吁，女性要行动起来解放自身，也拯救地球。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将使人类最终被视为是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者女人。一个接近女性的地球也将变得对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

德奥博纳指出，仅仅只是“转变”并不足以产生女性主义者需要的结果，为了引起人们对女性和地球现状的关注，女性主义者需要在西方发动一场思想革命。这本书的副标题——“革命或者转变”正体现了德奥博纳的这种观点。她宣称，生态女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构一个适宜生存的社会，让历史得以延续。她认为，人类和地球濒临灭亡，要阻止这种危险，就必须对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变革。她坚信这一目标只有靠生态的和女性主义的组织才能实现。

在书的第二部分，德奥博纳简要回顾了从旧石器时代以降至20世纪60年代，男性主宰的社会对妇女和自然的压迫和统治。她指出，在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中，女性掌有农业生产的支配权，女性的权力使她们具有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1](193)}她驳斥了那些认为母权制只是一种假想的神话的观点，批判了男权制权威的无限制主义，这种无限制主义指的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统治的父权制力量。德奥博纳指出，这种无限制主义的统治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使地球无法再给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只有生态女性主义领导一场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革命，才能终止这种无限制主义的统治。她大胆地呼吁：“今天我们必须把地球从男人手中夺走，为人类的明天重建地球。”^{[1](193)}

二、激进的行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行动渊源

生态女性主义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以现实的紧迫

问题为驱动力的草根政治运动。^{[2](35)}当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还没有广泛传播开来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生态女性主义重要意义的事件。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大批生态学著作出现，使人们了解了环境破坏的后果，增强了环境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妇女们受恶劣的经济条件所迫，加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大军，但是她们却遇到了同工不同酬、玻璃天花板、性骚扰等性别歧视问题。环境破坏以及妇女生育和儿童健康受到的严重威胁引发了美国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

最早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联系起来的事件是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召开的“妇女与环境”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父权制体系中妇女和自然的联系。1976年，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伊内斯特拉·金在美国佛蒙特州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开设了“生态—女性主义”课程。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能电厂发生泄露事故，这使得妇女运动、环境运动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突显出来。1980年，由于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造成的影响，伊内斯特拉·金和其他一些人在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组织召开了主题为“妇女和地球上的生命：19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会议，它标志着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这次会议开办了80多个工作室，分别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都市生态学、可选择技术运动等重大问题。这次会议促进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美的发展。会议的组织者伊内斯特拉·金与其他人一起，在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发起了名为“妇女五角大楼行动”的一系列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妇女五角大楼行动是第一次女性主义者大规模的反对环境破坏的示威行动。第一次示威行动大约有2000名妇女参加，第二次的参加人数大约是第一次的两倍。示威过程中没有演讲者或领导者，这些妇女围在五角大楼旁边，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抗议杀戮生命的核战争和核武器的发展，强调军事行动与生态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

此后，这类行动很快传遍了世界各地。1982年12月，在英格兰格林汉公地举行了抗议威胁地球生命延续的核导弹部署行动。伊内斯特拉·金在文章中描述了这次行动：“三万名妇女围住美国军事装备，挥舞着婴儿的衣服、围巾、诗歌和其他个人生活的象征物品。一时间，‘自由’这个词从她们的口中同时说出来，在基地的四周久久回响。三万名妇女以非暴力的方式封锁了基地的入口。”^{[3](27)}此外，198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州立大学召开了“妇女和环境：第一次西海岸

生态女性主义者”会议。1987年,全美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从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促进了两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妇女—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和“环境与发展妇女组织”(WEDO)。“妇女—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是由伊内斯特拉·金和斯塔霍克于1986年创建的,她们力图使它成为一个非机构性政治组织。她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包括多种族的组织,这个目标要通过在各种会议上实行种族平等而得以实现。但是,这个组织于1989年宣告结束了。尽管这样,对于许多曾经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而言,种族平等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另一个组织——“环境和发展妇女组织”是由前美国国会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和其他女性政治家于1989年创建的。WEDO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它把女性问题纳入到发展和可持续性当中来。WEDO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都与不同种族、阶级和国家的妇女生活密切相关。WEDO的许多目标也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1991年,由WEDO在迈阿密组织召开“为了健康的星球世界妇女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做准备。1995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视野”的会议。同一年,戴蒙德和麦茜特在俄勒冈格莱夫山创立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营地”。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伊内斯特拉·金有意识地把女性主义理论中相互冲突的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结合起来,力图建构更加一致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金试图发展一种“激发我们乌托邦的想象、体现我们最深层的思想改革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是对我们的想象的肯定,对父权制的否定”^{[4](202)}。她意识到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分裂削弱了它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女性主义需要合理的复魅,使精神和物质、存在和认识结合到一起。”^{[4](202)}金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亦即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这两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竭力推翻危及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建构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颠覆支持所有压迫形式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系统。金强调,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这两个部分必须辩证地共同发挥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是和解和有意识地调停,是承认历史的阴暗面和一千多年来妇女隐藏的无声的行动……它是被压迫者的回应——所有被压迫者都被贬低、被否认,以便建立多重统治制度的父权制文明。它是被否定的、丑陋的、无声者的潜

在的声音——所有这些事物都称为‘女性气质’。”^{[4](205)}

三、古老的传统智慧：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渊源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自古有之,这种联系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长久地持续下来。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统治、掠夺妇女和自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美国文化史学家、社会思想家里安·艾斯勒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这种统治模式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4500年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征服印欧社会开始。

在西方历史上的史前时期,人类居住在伙伴关系社会中,那时,男性地位和他们的社会职能并不在女性的地位和社会职能之上。那时的社会是非支配性社会,不是把地球当作人类获取利益、取之不尽的资源,“它们具有一种生态意识,亦即人类应该敬畏地球。”^{[5](23)}在柏拉图时代(大约在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8年),妇女孕育生命的权力仍受到敬畏,人们用艺术形式将其偶像化。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他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动物,他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它的灵魂是一位女性,“在起源和卓越程度上都比身体更加居先、更加古老”,因而它“成为统治者和霸主,身体则成为它的臣民”。灵魂渗透于宇宙的有形身体之中,围绕着身体并“在灵魂内部旋转自身”。“作为我们的看护者”的地球则被置于宇宙不可变动的中心”。^{[6](11)}女性被认为是受人敬畏的宇宙运动的源泉,与此类似,地球和地球的繁殖周期(如季节的更替等)也受到人类的敬畏,

女神不仅仅只是代表生命的繁殖,在许多社会里,女神崇拜行为包含了这样的观点:把地球当作一位创造和哺育生命的母亲。妇女和地球的联系使妇女和地球同样受到敬畏。然而,随着印欧人的第一次入侵,人类的伙伴关系社会终止了。印欧人带来了愤怒的男性神祇,产生了彼此互相反抗以及反对外来成员的暴力传统,他们赞美男性、男性的统治和压迫,用暴力粗暴地掠夺地球,他们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取代了古希腊、埃及、苏美尔人关于人类和自然的非等级制关系的概念。妇女从事的维持生命物质基础的工作逐渐遭到贬抑,随之而来的是,与妇女工作有密切联系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资源(土壤、水、植物等)也遭到贬抑。农业的发展以及把动物和妇女视为奴隶,这些都巩固和加强了男性的权力。由于这些变化,男性取代女性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并且消灭了母系继嗣。

人类从伙伴关系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男性主宰的宗教的发展。父权制下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贬低自然和妇女的价值。在希伯来《圣经》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上帝创造和统治的，上帝是主宰所有生命的男性。以神学为基础的希腊哲学此时也发生了激烈的转变。柏拉图设想了一种本体论的等级制：非物质的精神世界在物质的宇宙之上。在这个等级制中，“男性、女性和动物按降序排列。”^{[7](17)}任何与女性和自然的“低等”特质相关联的事物都遭到贬抑。当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后，女神崇拜衰落了。那些继续女神崇拜，拒绝信奉男神——上帝的人被视为是巫师，是罪人，受到残忍而痛苦的惩罚。

“统治”的思想(男人统治女人、人类统治非人类生命)牢牢占据了宗教和哲学中的位置，同时，也成为文学艺术中一种牢固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田园诗将自然符号化为一位善良、仁慈的女性，默默地向世人奉献她的慷慨。“在田园意象中，自然和女人都是从属的、本质上被动的……这种田园模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耕种和培育着的自然可作为一种商品来利用，作为一种资源来控制。”^{[6](10)}

妇女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显著变化是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前现代社会里，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劳动提供了家庭生存的物质基础。妇女日常的劳动——种植粮食、准备食物、生育、抚养孩子，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贡献而受到尊敬。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劳动变成了可以估价的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由于妇女的劳动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妇女的劳动也就不能产生利润，所以也就没有价值可言。由此得出结论：妇女的劳动对社会没有做出贡献。当男人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劳动力后，他们不再可能是土地所有者，土地被资本家侵占，这进一步减少了女性为家庭提供资源的可能性。即使女性在家庭之外能找到工作，她们的收入也大大低于男性，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排在第一位，而收入仅仅是补充性的，而且妇女在外工作时，家庭的健康和营养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妇女被认为不适合扮演资本主义劳动力的角色。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妇女逐渐丧失了她们擅长领域的控制权，虽然她们曾经在这些行业中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需的产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医学的发展，它使妇女远离了看护孩子的工作，甚至可以取代她们的生育。17世纪末，生孩子成为了男医生和“男助产士”手中的活。^{[6](171)}现代科学则走得更远，

它甚至否认妇女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性。英国人威廉·哈维在研究了鸡的生殖过程之后，把它与人的怀孕及分娩过程进行比较并指出，“女性单独不足以产生胚胎并养育和保护幼体，男性生来就与她结合，作为优越者和更有价值的始祖，作为她分娩的伙伴和弥补她不足的手段。”^{[6](174)}到了17世纪中叶，认为“女性精子”对生育并不做贡献的观点仍然很有影响。进入19世纪，达尔文理论被发现对妇女有社会意义，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用来维持妇女原有的位置。在达尔文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们比较了男性和女性的头骨和脑的各部分的大小，以证明性别差异的存在，解释女性智力较低下和易动感情的气质。20世纪，“男女之间激素的差别曾被用来暗指那些显示出智商较高，有竞争性行为，有领导和行政才能的妇女的男性激素处在异常水平。”^{[6](179)}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科学的进步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统治和破坏。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把自然视为机器而非活的有机体。这一新的世界观成为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强制自然于实验室中，用手和心来解剖它，进入自然最隐密之处”。^{[6](171)}培根和他的追随者们改变了人类看待自然的观点，自然从一个万物有灵、有机的原始社会变成了一个为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被人类操纵的机械的框架。人类看待自然的观点的转变导致了“自然之死”，这种观点使人类操纵自然的行为合法化。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卡洛琳·麦茜特指出，机械论的世界观导致了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使人们相信，科学研究是力图寻找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无关境域的知识。这种机械的自然观把权力与秩序的概念作为理解社会所必需的要素，在争取权力和维护秩序的过程中，产生了牢固的等级制价值观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拥有权力最多的人具有控制他人的合法权利，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一个主张人人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地球持续发展的能力。基于上述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者对科学主义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四、结语

当下，生态女性主义被认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最新思潮，已成为“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8](286)}生态女性主义流派众多，观点各异，表现出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征。但是不管各流派的生态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所有的生态女性主

义者都相信,统治自然与压迫女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雷德福·卢瑟在她的书中指出:“妇女们必须看到,在一个以统治模式为基本关系模式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联合起来,以实现重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撑社会价值观的目的。”^{[9](204)}基于这一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者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力图建立一个以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原则为标准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张改变人类统治自然的思想,改变导致剥削、统治和攻击性的价值观。因此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实践。

此外,从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语境来看,它与人类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反思有关,是人们对自然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危机和人类精神危机的出现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溯源中,我们发现,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思潮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与现实依据。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分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然而它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至史前时期,这表明,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自古有之,这种联系通过文化、语言和历史长久地延续下来。在当下,人类关注这个古老的问题,对其做出新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评价当代社会的新视角,并将产生变革现实

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Francoise D'Eaubonne. The Time for Ecofeminism[C]// Carolyn Merchant. Ecolog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 [2] Karen J Warren.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 [3] 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C]// Judith Plant.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New Society Publishers, Santa Cruz, 1989.
- [4] Ynestra King. Feminism and the Revolt of Nature[C]// Carolyn Merchant. Ecolog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4.
- [5] Riane Eisler. The Gaia Tradition and the Partnership Future: An Ecofeminist Manifesto[C]//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Orenstein. Reweaving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Ecofeminism.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0.
- [6] 麦茜特. 自然之死[M]. 吴国盛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7]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Ecofeminism[C]// Carol J. Adams, Ecofeminism and the Sacred. New York: Continuum, 1993.
- [8] 多诺万.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赵育春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9]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an/New Earth[M]. New York: Seabury, 1975.

An exploration of western ecofeminist origins

WU 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Ecofeminism is an umbrella term and a multicultural thought that has multifarious sources. Using a genealogical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of ecofeminist origi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oretical emergence, arising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pointing out that ecofeminism is not only a cultural theory, but also activities for realizing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a philosophical view of seeing the world and people. Beside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ecofeminist origins and mak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m can provide u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eeing and evaluat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ecofeminism; literary criticism; Franleised; Eaubonne; Ynestra King

[编辑: 胡兴华]